

鴉片戰爭期間中國朝野的天朝意像及其衍生的觀念、態度

與行動 (1839—1842)

劉紀曜

一、引 論

現代的中國人論到鴉片戰爭，多少都帶點事後的聰明，例如蔣廷黻先生認為：「倘與南京條約相較，就能斷定穿鼻草約原是琦善外交的大勝利。」（註一）姚廷芳先生承繼蔣廷黻的餘緒，更認為：「琦善耆英在近代史人物中，確系先知先覺者。他們對於事情之瞭解，對於傳統的改革，頗具有革命性創建性之改進。」（註二）但假如我們明白道光朝中國朝野的天朝意像（image），則除了事後的聰明，我們實在看不出穿鼻草約是琦善外交的大勝利，更看不出琦善耆英具有何種革命性與創建性。這種論點也許只能提供現代中國人一種歷史的教訓，但並不能幫助我們真確的原本的了解當時中國知識份子對外的觀念、態度與行動。另外，論到鴉片戰爭，更多的是帶著嘲諷的眼光，認為當時的滿清政府和士大夫，是保守、頑固、自大、愚昧而驚慌失措的一群。雖然道光朝的滿清已經趨於衰弱，但這種看法只不過是現代人不負責的情緒反應。論到鴉片戰爭却不討論當時朝野——尤其是主持外交的決策者——對中國本身的看法或意像，這是太過簡化的說法，是不知道天朝這個意像及其伴隨衍生的對外觀念、態度和行動，在鴉片戰爭期間每一個階段的關鍵性地位。因此，我們如果想要深入了解鴉片戰爭期間，中國方面的觀念、決策與行動，只有拋棄事後的聰明與情緒性的反應，才能有較真實而理性的觀察與敘述，而關鍵所在，則是當時朝野——尤其是道光皇帝——的天朝意像及其衍生的對外觀念、態度與行動。

清朝自始即以天朝自居，天朝這個意像，在鴉片戰爭期間，甚至戰後，一直支配著中國的決策者與一般知識份子。許多學者認為矛盾或感到迷惑的事，例如道光皇帝為什麼突然查辦林則徐？道光皇帝這麼做並不是怕事，或因定海失守而「驚惶失措

力主撫議，否則以後的極力主戰又作何解釋？歷史學者對這都沒有令人滿意的解釋，只簡化成撫夷派得勢或勦夷派得勢，這種解釋有等於無。其實，這完全是道光皇帝的天朝意像受到英國人的刺激而產生的決策反應。當然，我並不認為天朝意像是解釋當時朝野的觀念態度與行動的唯一因素，但是一必要且不可或缺的因素，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而陷入沒有必要的責備、嘆息或嘲諷。

所謂意像，最普遍的意義是一個或一組事物或目標 (objects) 的抽象的精神表象 (representation) (註三)，根據 C.E. Izard 與 S.S. Tomkins 的意見，意像是人所想要實現或重演 (duplicate) 的一個設計好的可能性 (projective possibility) 或目的狀態 (end state)。而意像如果要被達成 (be achieved)，它必是先於且支配著行為。(註四) 就道光時代的中國來說，天朝並不是一個中國人想要實現的可能性，而是傳統的歷史事實，是中國人所堅持實現的目的狀態，是中國人所共有的對本身的評價與期望。我們可以說，天朝這個意像是清代中國朝野所共有的文化的自我意像 (cultural self-image)，是這個意像決定了中國與外族互動時所採取的行為模式，在鴉片戰爭期間，中國朝野在事實層面上所堅持與企求實現的，就是天朝這個意像。

二、天朝意像與馭夷的技巧

中國自春秋時代開始就已有非常發達的夷夏之防的觀念，這種觀念或態度是建立在文化意識之上，認為華夏文化才是真正的文明人的高等文化，而四周的遊牧民族——夷狄，簡直就毫無文化可言，是野蠻人甚至與犬羊同類。因此只能以夏變夷而不能以夷變夏，這種觀念在堅守文化傳統的中國人的意識裏，是根深蒂固歷久不變的。自秦漢之後，由於幅員廣大文化發達的大一統世襲皇朝的建立，使原有立基於文化標準的夷夏之防觀念，加上古老的天命觀與儒家的德化主義，漸漸形成中國人的天朝意像。(註五)

在古代中國人的觀念裏，天是一切萬物的主宰，天命是最高的權威與指導原則，故天朝意像的核心是天命所立的天子，因

爲是天之子，所以具有最高的道德與權威，支配主宰著地上的一切。本來在孟子天人相應的學說裏，是有德者始能被天（或人民）所揀選而佔有主宰者的支配地位以行德政，但因五行學說的盛行與遷就實際的政治爭鬥及家天下的事實，於是孟子天人相應的學說乃被反側而行：因爲佔有天子的地位，所以具有天命，也因此而必須有德，以綏化四方。這種與天認同而法天的意識形態，同時配合根深蒂固的夷夏之防的觀念，使中國發展了一套特有的對外態度與技巧。理論上，天包有一切，而爲萬物所敬畏。天是不可觸犯的，觸犯了天威，必然遭到天討。對天恭順，必然受至公無私的天的恩賜——佑其昌隆萬世。因此人必須畏天威而感懷天德。同理，承受天命而立的天的代理人——天子，也就領有地上的一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註六）。而且天子所在的天朝承天之意發展了最高的文化與道德，用來化育天下一切人種，因爲天朝之外盡是犬羊之性的野蠻人，有待天朝仁德的化育與體恤。因此天朝與外夷的關係，正是天與人的關係，天朝是具有天威高高在上而不可侵犯的，否則必遭天討。然而天朝也具有至公無私的天德——一視同仁（註七）——與宏大的天恩——化育諸外夷，使外夷懷德感恩，而欣然來朝，這就是所謂懷柔遠人。故有朝貢制度的形成。就藉著這種天命觀念與實際上較四方優越繁榮的文化而形成的夷夏觀念，中國建立了天朝意像。這是中國對世界等級性的二分法，一個是道德高尚文化發達，獨特單一高高在上而無所不包的天朝，另外則是一律平等而有待天朝化育的各種族。

然而中國的天朝意像本來只是中國一廂情願的想法，雖然這意像裏有很高的文化意識，但根據這意像而形成的朝貢體系，顯然的含有自衛的意義。要免於被外夷侵犯，首先自己必須具備阻嚇的威勢，否則毫無實力而以老大自居，徒成笑柄，也是因爲具有必要的威勢——縱使不是永遠如此——才使中國的天朝意像成爲事實。但中國的天朝意像是自衛性的而非侵略性的，因此在威勢之外，必須以恩德——天朝給外夷實質的利益——去安撫籠絡外夷，這就是所謂羈縻（註八）。

在此我們必須特別注意，德威兩種手段在中國驅夷技巧裏相互依存運用的微妙關係。鴉片戰爭期間，王得祿就說出被普遍接受的傳統看法：「自古馭遠之道，莫善於威足使之畏，而德足使之懷，然知懷必由於知畏，故用威更先於用恩。」（註九）可見在傳統驅夷的技巧裏，德威是兩種互相支援運用的手段。在中外發生衝突的時候，就先用威嚇阻外夷使外夷知畏，再略施

小恩，表示不懲罰，反而給予好處，使外夷知懷，亦表示天朝天子的聖德廣被。但如果不幸威不足使外夷知畏，則只有純用恩德去敷衍收買外夷，使之知懷，以達到免於被攻擊的目的。這是恩德在兩種不同情況下的運用，而且因為孟子以道德為標準的天人相應說以及儒家德化主義的影響，中國人認為天朝高超的優越性，並不基於霸道的威勢或武力，而是基於王道的道德和仁義，因此天朝的廣大與富庶，正是懷柔惟利是圖的四夷的資本，亦因此更顯示天朝宏大的聖德。因為在中國人的觀念裏，只有有德者才能施恩，故能施恩者亦必然有德，因此天朝天子的聖德亦必從天朝廣被外夷的恩澤而得一明證。

中國天朝意像與朝貢制度完全建立的歷史發展，不是本文論述的範圍，但至遲在明朝已經完全建立此種體系。滿清入關，奪取天朝的政權，便馬上以天朝自居，以罕見的天才，整個吸收明朝的體制，甚至建立比明朝更嚴密的君主獨裁制與朝貢體系，而且積極的想扮好天朝這個角色。因為滿清是以外夷入主中國，因此必須更積極更努力的去扮演去維護天朝體制，以確定鞏固本身在中國的地位。經過康熙乾隆三朝的征伐與經營，滿清建立了中國從來沒有的最龐大而完整的朝貢體系，清廷够資格宣稱自己是名符其實的天朝。因此清廷把定制之外的西洋人，也當作來朝貢而需要懷柔的夷人，是可以理解的，這本來就是天朝對外夷應有的態度。例如康熙對俄羅斯的曉諭（註一〇），乾隆時代兩次的英使覲見問題，以及種種防範外人的所謂天朝體制，都可看出清廷的天朝意像，以及對此意像的執著。如邵正笏就為此而甚感自鳴得意，他說：「竊惟粵東開禁，南洋准令遠夷通市，自國初迄今，垂百數十年，事事率由舊章，人人恪遵定制，萬邦向化，重譯傾心，甚盛事也。」（註一一）就是這天朝意像與體制的執著，才激起鴉片戰爭，並決定了戰爭發展的途徑與決策。在詳細討論鴉片戰爭期間，中國朝野的天朝意像，及其衍生的對外行動與決策之前，我們先扼要的檢視道光朝鴉片戰爭以前，清廷對中外衝突——主要是中英衝突——的態度與解決問題的行為模式，與道光皇帝維持天朝體制的意願。然後我們可以發現，這行為模式，在鴉片戰爭期間，一直為道光皇帝及大多數的士大夫所堅守著。

在中外的關係中，中國方面既認為貿易是天朝給外夷的恩賜，則外夷除遵守天朝法度外，自然不該有非分的要求。而英國自乾隆以來，一再遣使多所要求，且在道光初年發生過好幾次衝突，難怪道光皇帝認為「噶咭喇國夷人素行兇狡」。道光朝，所

有的官吏都緊記「交涉外夷，有關國體」這句話，凡有交涉事宜，都必須緊守天朝體制，以符合天子「於懷柔外夷之中，仍不失天朝體制，方爲至善」（註二）的希望。而如前所述，清代所普遍接受的馭夷技巧，是德威並用，但一遇衝突，則用威更先於用恩，亦即道光皇帝所說的，「先威後德，控制之良法也。」（註三）其目的只是在維持本有的天朝體制。所謂威就是當西洋人違反了清廷的禁制，而不服「開導」，「頑抗」到底，則清廷只有照例用封鎖停止貿易的辦法，顯示天威，企圖屈服西洋人。因爲按理想的規範來說，中國人是重農輕商重德不重利的，因此把來華貿易的西洋人，視爲惟利是圖之輩，照當時情況，這也有幾分真實與經驗的根據，彼既以利來，我則以利啖之，比較容易解決問題，故清廷手裏解決中外衝突的王牌，即利之所在的貿易。及至西洋人無可奈何爲了貿易再度屈服，遵守天朝的體制，清廷就認爲西洋夷已「懾於天威」再度恭順，天朝的威嚴已經維持，因此再開輪貿易，表示天朝對外夷的恩德，以便懷柔安撫。假如「外夷」頑抗到底決不屈服恭順而給天朝太大的挑釁，則天朝亦只有擺出應有的威嚴：「驅逐出省，以示懲創」。這就已到了決裂的地步。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外——尤其是中英——之間雖然屢有衝突，但清廷都能以封鎖等強硬措施，迫使西洋商人屈服，而堅持原有的天朝體制（註四）。道光十四年的律勞卑事件，中英之間雖然差點走向決裂的地步，但律勞卑最後還是被封鎖屈服了。由於多年來屢試不爽的輝煌效果，使道光皇帝及一般對外交涉的官員更堅決的執著於這先威後德的行爲模式。鴉片戰爭仍然是這模式的應用，只是這回走到決裂的地步，而中國第一次嚐到失敗的滋味，但是並沒撼動這個對外的行爲模式，甚至因自我防衛而使天朝意像更加的高漲起來。

三、赫赫天威：林則徐的天朝意像及其對外態度與行動

林則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是鴉片戰爭的關鍵性人物，這是中外一致公認的，到目前爲止，討論鴉片戰爭的書，亦以林則徐的份量最重，但一般學者只注意林則徐禁烟的強硬措施，以致引起中英衝突的擴大，却不探討林則徐採取強硬態度的由來，故有林則徐善變劣論的出現，如此，除了以結果去評判之外，別無他法，這完全是事後的聰明，假如我們了解林則徐的人格與天朝意像，則更能給予公允的評論，而不致落入「事後的先見」之陷阱。

林則徐是受傳統儒家思想與教育影響很深的人，在道光朝的政治舞台上，他總是積極的按照理想的社會規範去完成他所扮演的每一個角色，再加他擇善固執的堅強個性，使他成為晚清非常突出的人物。林則徐絕決的禁烟態度與堅持到底的精神，可由他公羊學派的社會改革思想與擇善固執的堅強個性得到解釋，但他對英國人的態度與禁烟的策略及行動，則非由他天朝意像來理解不可。林則徐既然誠信的接受傳統儒家思想與理想的社會規模——帶著公羊學派的精神——而堅決的加以實踐，則，他具有當時流行的天朝意像，而且積極的在事實層面上去謀求實現這個意像，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

林則徐與當時一般知識份子一樣，完全相信對來華貿易的西洋人來說，中國是高高在上的天朝，貿易是天朝賜予的恩惠，貿易只是銖絲小利，對重德不重利的天朝顯得無足輕重，因為「天朝四海為家，大皇帝如天之仁，無所不服，而遐荒絕域，亦在並生並育之中。」（註一五）因此英國人只不過是天朝所化育的諸夷人之一，而且「大黃茶葉湖絲等類，皆中國寶貴之產，外國若不得此，即無以為命，而天朝一視同仁，許其販賣出洋，絕不吝惜，無非推恩外服，以天地之心為心也。」（註一六）這種天朝意像是林則徐行動的關鍵所在，假如沒有這種天朝意像，縱使以林則徐的人格與個性，亦不會有相同的行動與態度。林則徐既然認為開港貿易是天朝有恩於英國，而英人所進口竟是「害人以利己」且「不容於天道」的天朝禁物——鴉片，這不但是有恩不知報，而且是藐視天朝的威嚴。在林則徐的意識裏，天威豈是夷人所能藐視的，天朝懷柔遠人並非任由外夷為所欲為，而是必須恭順的遵守天朝體制。林則徐認為假如英國人還想要得到天朝賜予的大黃茶葉以維持生計的話，則應恭順的俯首聽由天朝的裁決，假如夷人桀驁難馴，冒犯天威，則天朝亦只有以威制之，使其馴服，以維持天威於不墜，做到名符其實的天朝。這是林則徐採取堅決的高壓政策——如圍館、強制繳烟、切具甘結與封港——的原動力。

由於林則徐堅定而自信的天朝意像，使他並不把英國人看在眼內，等到義律不得已繳烟以後，林則徐更認為是「夷人震懾天威」，使他的天朝意像與堅決的態度，得到增強的作用。因而更堅決的主張，非英國人切具甘結不可，以為這是一勞永逸的辦法。在要英人切具甘結時，林則徐不止一次的宣布：「雖以天朝柔遠綏懷，亦不能任其藐視，應即遵辦新例，一體從重懲罰。」（註一七）在「擬諭喚咭喇國王檄」裏也滿懷自信的說：「我天朝居臨萬國，儘有不測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誅，故特明宣定

例，該國夷商欲圖長久貿易，必當懷遠憲典，將鴉片永斷來源，切勿以身試法。」（註一八）此時的林則徐一意認為天朝自有法度，且自認為已「如此曲體夷情，實屬仁至義盡，若（夷人）再執迷不悟，則不能不示以嚴威。……若不敬聽教誨，深恐後悔難追也。」（註一九）英國人只有遵從天朝法度，而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最後終因林維喜案的交兇問題與具結進港貿易的無法妥協，而掀起軍事衝突，鴉片戰爭正式開始，中國決定封港。在林則徐則認為義律已多次冒犯天朝，若不示以天威，使其俯首聽命，則天朝亦不成爲天朝了，以此，林則徐的態度決絕，已無妥協的餘地。雖然義律請求開港或暫居澳門，林則徐一意認為英國人過度冒犯天朝的體制與威嚴，封港之後方表示「投誠」與「恭順」，難保不反覆無常，而且封港是英國人自絕於天朝，天朝一定要使出堅決的鐵腕，方能使英國人完全屈服，亦以此表示天朝對不恭順的夷人的懲罰。因此，拒絕義律的要求，這時，假如義律不完全屈服順，則只有走上決裂的地步。一般的學者均認為林則徐是主戰派的領袖，但林則徐堅決的主戰態度是在定海失守之後，在這之前，他雖然態度強硬甚至主張以兵威制之，但並未料到，實亦不願真引起全面戰爭，廣東的軍事衝突，林則徐亦不認為是全面的戰爭，故英船的北上，他聽信傳言以爲是「逕達天津，求通貿易」。定海失守之後林則徐主戰的目的亦只是爲了維護天朝的威嚴與體制，他堅決相信：「一身之獲咎猶小，而國體之攸關甚大。」（註二〇）「然未有浙洋之事（定海失守），或尙可以仰懇恩施（註二一），今既攻占城池，戕害文武，逆情顯著，中外咸聞，非爲難許通商，自當以威服叛。」（註二二）林則徐的天朝意像不容許英國人的冒犯，林則徐接受了英國人的挑戰。只是林則徐在清朝的對外行政體系（見註二一）與道光皇帝的天朝風度之下，在一般知識份子與廣東平民的憤憤不平聲中，退出了鴉片戰爭的舞台。

四、道光皇帝的天朝意像及其決策

一般論到鴉片戰爭期間，中國方面的決策與應對，大都從林則徐的主戰開始，再到伊里布、琦善，最後論到耆英伊里布的撫議，而把中國方面的最高決策者，戰爭期間最具關鍵性的人物——道光皇帝——忽略了，有的亦只是輕輕的幾筆帶過，好像道光皇帝是無可奈何的被動者，如郭廷以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中對道光皇帝的評論：「就過去三年中（一八三九六月至一八四二

六月），北京政府的搖擺看來，道光皇帝是最無定見的一個人——也可說是形勢逼得他如此——時而主戰，時而主和，戰而又和，和而又戰。」（註二三）這種看法現在幾乎已成公論，然而，道光皇帝真是如此毫無定見而又紛亂矛盾得令人迷惑？這種評論完全是了解道光皇帝的說法，假如我們了解道光皇帝做爲一個天朝的天子，與這個地位所加諸於他的行爲規範及道德期望，我們就不會認爲道光皇帝的決策是前後矛盾而毫無定見，我們可說有一個固定的因素，就是這同一個固定的因素使道光皇帝主戰又主和，這就是道光皇帝做爲一個天子的天朝意像與自我意像（self-image）。因爲道光皇帝在鴉片戰爭期間的地位與重要性，被一般學者所忽視和誤解，因此在本節裏，我想詳細的討論道光皇帝的天朝意像與其決策轉變的關係，讓我們重新認識道光皇帝在整個鴉片戰爭裏的關鍵性地位。

道光皇帝（一七八二—一八五〇）從即位開始，就誠心誠意的遵從中國文化所加諸於天子的理想角色規範與道德期望，這自然是自幼的宮廷教育與自我期望的結果，此由道光元年十一月所頒的御製聲色貨利論可得一明確的認識。此論略謂：「我朝定制，皇子皇孫均於六歲入學讀書。凡聖賢之所發言，自幼無不誦讀講肄，以爲修身立志之本。其奈終身抱道克己復禮者甚難，蓋知之非艱，行之艱也。在常人尤不可不檢束身心，屏除聲色，爲人君者尤當以禮自防，無爲所惑。常人惑之害及一身，人君惑之，害及天下。」（註二四）又謂：「人君以一身上承堯舜禹湯之緒，下慰億兆烝黎之望，萬幾至頤，一心應之，無偏無倚，始足以昭感化。」（註二五）又說：「人君端拱於上，執兩用中，誠非易易，公其心以與天下萬物相見。」（註二六）凡此皆可看出道光皇帝做爲一個天子的誠心與認真。在鴉片戰爭期間，道光皇帝就把天朝天子對外夷應有的態度與辦法完全表現出來，檢視道光皇帝在鴉片戰爭期間的決策與表現，我們即可充分理解中國天朝與外夷之間的關係，以及互動的行爲模式，完全是前述先威後德模式的表現，可是這回英國不願在第二步就罷手，事態擴大，逼得道光皇帝不得不上從來沒用過的第三步——以兵威徹底屈服英國，只是結果不能如願，而多加一層曲折罷了。

道光十九年七月九龍第一次中英軍事衝突以後，道光皇帝給林則徐的指示是：「當此得勢之後，當不可稍形畏葸，示以柔弱；如果該夷等畏罪輸誠不妨先威後德，倘仍形桀驁或佯爲畏懼，而暗布干戈，是該夷自外生成，有心尋畔，既已大張撻伐，

何難再示兵威。」（註二七）因爲九龍衝突中國認爲是打了一次勝仗，略示天威，氣勢更盛，道光皇帝亦因此而更堅信傳統的先威後德是控制外夷的良法。此時的光緒皇帝並不是主張全面開戰，只是略示天威，使其知難畏威，然後接受天朝的恩撫，俯首遵從天朝原有的法度。等到十一月，穿鼻海戰的消息傳到京師以後，道光皇帝認爲「英吉利國夷人自議禁烟之後，反覆無常，前次胆敢先放火炮，旋經割讓，僞作恭順，仍勾結兵船，潛圖報復。彼時雖加懲創，未即絕其貿易，已不足以示威。……即使此時出具甘結，亦難保無反覆情事。若屢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屬不成事體。至區區稅銀，何足計論。我朝撫綏外夷，恩澤極厚，該夷等不知感戴，反肆騷擾，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尙何足惜。著林則徐等酌量情形，即將英吉利國貿易停止，所有該國船隻，盡行驅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結。」（註二八）這是道光皇帝的天朝威嚴受到英國人太大的冒犯和挑釁，因而使出的傳統示威辦法——停止貿易，希望以此屈服義律，就像道光十四年屈服律勞卑一樣。

此時的光緒皇帝並無開戰之意，只是運用他先威後德的老辦法，既已示威就把希望寄託在「後德」之上，希望以重開貿易誘英國接受天朝法度而和平解決爭端。但林則徐與義律的交涉並不成功，義律只是等待訓令和援軍，並不完全屈服，如此當然沒有妥協的希望。等到道光二十年五月，英國東方遠征軍到粵，封鎖廣州，隨即北上，六月初定海失守，中國沿海告警，英軍直通天津，道光皇帝雖然「實深痛恨」，但不願事態擴大，諭令伊里布密查「致寇根由」，對林則徐在廣東的措施的信任已開始動搖，責備林則徐辦理不善，不該生出許多波瀾（註二九），而難以收拾。這並非如一般所論，認爲道光皇帝是因定海的失守而驚慌失措，而是清廷辦理對外交涉的程序使然（見註二一），這時的光緒皇帝並不把英國人看在眼裏，只是不想輕易開啓邊釁，以爲天朝恩撫外夷，實在沒有與外夷開戰的理由和必要——除非外夷對天朝的挑釁超過天朝所能容忍的限度——自然的以爲是林則徐辦理不善，不能服外夷之心。等琦善奏呈英外相的照會，道光皇帝即抓住照會中「求討皇帝昭雪伸冤」一語爲下台階，以爲只要表示「大皇帝統馭寰瀛，薄海內外，無不一視同仁，凡外藩之來中國貿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懲辦。」（註三〇）並且爲表示天朝大公至正起見，查辦林則徐，改派琦善爲欽差大臣至廣東重新交涉，要英船南還，赴廣東聽候辦理。

道光皇帝並不是不知道英相的照會裏還有其他的要求，這些要求沒有一項是在天朝體制之內而能允准的，故他要琦善婉辭

英人。而且道光皇帝的天朝意像使他採取取巧的決策，以為只要查辦林則徐表示天朝的公正，然後再開港貿易表示天朝的恩德，即可令英人就範，這已是中國無可奈何的最大讓步。（註三一）所以等到懿律答應南返廣東重開談判，立刻懲處林則徐，表示天朝的大公無私與恩德，藉此懷柔英人。但道光皇帝對「犬羊之性」的英國人並不信任，一方面也是為要增加本身談判的後盾，故諭令沿海積極籌備邊防，以備反覆無常的英人。此時的光緒皇帝除了准予伸冤之外，根本毫無答應英人要求的意思。這完全是天朝先威後德的馭夷技巧。

道光皇帝以為他已做了最大讓步，英國人則應交還定海，前赴廣東恭順的聽候天朝的處置，並重新遵守天朝體制。但是英國並不如此恭順，反而占據定海，以此在廣東多方要挾請求，甚至在福建截船虜人，無視天朝的威嚴，這是道光皇帝不能忍受的，無怪他氣憤駭異，十一月初給琦善的上諭謂：「如該夷實係恭順，退還定海之外，別無非禮之請，自可仍遵前旨查辦，倘敢驕張，始終桀驁，有必勦辦之勢，著即一面奏聞，一面相機辦理。」（註三二）等到廣州談判的情形奏到北京之後，由道光皇帝一連串的上諭，我們可看出道光皇帝遭到藐視而受傷的天朝意像，以及因此而發的氣憤與報復，如道光二十年十二月的上諭：「若不乘機痛勦，何以示國威而除後患。」（註三三）又謂：「非仁義所能感格，其勢不得不加征勦，以示創懲。」（註三四）道光二十一年正月接獲琦善奏稱「辦理實形棘手」，硃批：「有何棘手之處，祇欲卿相機勦辦，逆夷授首，以彰國威。」（註三五）由此可見道光皇帝的堅決態度，他已認定英人非天朝恩德所能感化，唯有走上決裂的第三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五日，大角、沙角砲台失陷的消息傳到北京，道光皇帝毅然下詔宣戰，想以天朝的兵威迫使外夷完全屈服。道光皇帝自信以天朝之大，不難勦定遠離本國的英人，否則難慰自己受損的天朝意像。是這受損的天朝意像，使道光皇帝堅持到底。

為了更詳細的探討道光皇帝的天朝意像及因此而衍生的態度、決策甚至情緒反應，我們有必要更深入的檢視道光皇帝一意識戰的二年半中（道光十九年十二月至二十二年六月）堅持到底的決策。但是，我們必須了解，做為一個天朝體系的最頂點——天子，道光皇帝的天朝意像是經常與自我意像相混同的。因為天朝的存在與被承認，有賴天子的存在與被承認，而天子就是天朝的代表與象徵，更是天朝體系得以運作的樞紐，因此在很多時候，道光皇帝的自我意像也即是天朝意像。例如道光二十一年正

月，琦善奏，擬允英國人要求以成和議，疎拙謂：「朕斷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戲弄，迷而不返……無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嚇，甘爲此遺臭萬年之舉，今又擣舉數端，恐嚇於朕，朕不懼焉。」（註三六）批中的所謂「擣舉數端，恐嚇於朕」，是指琦善力言民情不堅，兵力不固，軍械無利可恃以及援仗之不利。但是道光皇帝的天朝意像使他不信亦無視於此，而謂是琦善的恐嚇，甚且，外夷以兵威逼成的和議，更是道光皇帝自視爲天朝天子的自我意像所難接受的，因此自謂「朕斷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戲弄，迷而不返。」（註三七）於是命琦善革去大學士拔去花翎，仍交部嚴加議處。並命奕山隆文及楊芳兼程前進，痛加勦洗，道光皇帝的憤恨，於此可見。故當伊里布奏稱收復定海，道光皇帝已不再認爲是英人的恭順，更不認爲是穿鼻草約的簽定與釋放英俘的緣故，而認爲「現因粵省命將出師，聲罪致討，方行繳還定海，全數起碇出洋，可見逆夷並無能力。」（註三八）並進而指責伊里布：「設使伊里布奉到進兵諭旨……一鼓作氣……復我故土，殲除醜類，庶足以伸天討而快人心。乃觀望遲延，……可謂庸懦無能之至。」（註三九）凡此都可發現，道光皇帝的天朝意像與伴隨此意像的情緒反應，都把道光皇帝的思路與對外夷的認識導向一定的方向，而且是主觀的方向，缺乏客觀的基礎與理性的思考，當然，當時不實的奏摺要負一部分的責任，但道光皇帝的天朝意像才是產生此一行爲的最主要因素。

虎門失陷以後，楊芳、怡良奏請「先准貿易，暫作羈縻」，道光皇帝的答覆是：「若貿易了事，又何必將帥兵卒如此徵調。又何必遽問琦善，所見甚差。」（註四〇）這是道光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的事，同日，因爲楊芳等「祇知遷就完事，不顧國家大體，殊失朕望」，因而交部議處。同時下諭：「此時更無他議，惟有進剿一法……斷不准提及通商二字，坐失機宜。」（註四一）這是道光皇帝因爲英人尚未屈服，天威不顯，故不准通商了事。道光皇帝一意主剿的目的，只是等著英人的屈服恭順，以滿足他的天朝意像。故等到廣州被圍，奕山被迫簽定廣州和約，於四月十五日將掩飾誇大的奏摺奏報（註四二），把被兵威所迫的城下之盟，說成是居民的請求全命與英人的恭順乞恩，正是道光皇帝日夜等待著的下台階，道光皇帝的准令通商，並非如郭廷以先生說的：「大概此時道光皇帝已知道中國非英人敵手。」（註四三）而是因爲他自以爲英人已經恭順，本身的天朝意像已得到尊敬。否則的話，他就不會仍然要英國人「稟遵前定條例，祇准照常貿易，不准夾帶違禁烟土，倘敢故

連，斷不寬恕。」（註四四）好像這場戰爭從來沒發生過似的，天朝仍然是原來的天朝，一切照舊，我們從道光皇帝的諭旨可以看得很清楚：「英夷自我兵兩次擊退之後（註四五），計窮勢蹙，併力進攻，該夷性等大羊，不值與之計較。況既經懲創，已示兵威，現經城內居民紛紛遞稟，又據奏稱該夷免冠作禮，籲求轉奏乞恩，朕諒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如英夷露有桀驁情形，仍當督兵勦滅，不得因已施恩，遽諸事任其需索。」（註四六）這那裏是認為中國非英國敵手，完全是天朝意像的表現。雖然六月間，閩浙總督顏伯燾奏報廣州和約與三元里事件的實情，（註四七）但道光皇帝除下諭旨調查外，總相信廣州和約簽訂以後的一段平靜，是英人已恭順聽命，故開始撤防。

但是，在道光皇帝以為問題都已解決，且開始撤防之時，也正是樸鼎查到粵開始北上的時候。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十，廈門失陷，道光皇帝除了覺得「該夷如此猖獗，實堪痛恨」之外，亦只有積極應戰，沿海戒嚴。從此一直到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末的浙東反攻，道光皇帝一意主戰，總認為：「惟該夷敢於如此猖獗，總因未加懲創，故沿海滋擾，藉端要求，如能處處痛勦申戒，使首尾不及相顧，該夷定帖耳懾服。」（註四八）命揚威將軍奕經總辦攻剿之事。由於定海、鎮海、寧波、餘姚的相繼失守，道光皇帝這才體認到本身兵務的廢弛與英國船堅砲利的真正威力。但天朝意像使他不能遽爾屈服，在浙江巡撫劉韻珂暗示羈縻的奏摺上，道光皇帝批道：「督臣（裕祿）殉節，勢若瓦解，朕愧恨交加，鞭長莫及。汝意在言外，朕原鑒及。然朕萬難處置之情，諒汝亦必知之。」（註四九）所謂「萬難處置之情」，就是嚥不下以堂堂天朝被逼而向外夷款和這口氣，因此寄望奕經的最後反攻。等奕經的浙東反攻失利，慈谿潰敗，道光皇帝失望之餘，不得已而有從事羈縻的意圖，派耆英、伊里布赴浙江釐命，相機辦理，此時道光皇帝的憤恨可想而知。但道光皇帝仍然緊握着做為天朝天子的自我意像而不完全認輸，仍然採取天朝傳統的恩威並用的兩面策略，道光皇帝始終相信這是最好的取夷方法。直至此時，他對英國仍然沒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仍然緊守天朝這個中心意像。一面要奕經認真勦夷，一面又要耆英相機撫夷，道光皇帝這種兩面策略，在奕經奏請會同耆英辦理攻剿事宜的奏摺的砂批裏表現的很清楚：「所奏與朕意大不相符，卿斷不准稍有瞻顧，朕惟責卿以勦賊復地，卿無恤其他。……耆英原因另有委用之處，果否施行，俟朕隨時裁奪，無非備具一端而已也。如能勿用，朕所深願。止須卿成功後，不待辨而俱

明晰矣。」（註五〇）道光皇帝最怕的，是以天朝之尊而任人需索，故雖有羈縻的意圖，而且軍事屢次失利，但總抱著最後一擊的希望，企圖顯示一點兵威給英國看看，產生阻嚇作用，以作為羈縻的後盾，和討價還價的基礎，而不是長城盡毀迫於兵威的任人索求。甚至幻想能够一舉屈服英國，而能不用羈縻。道光皇帝只是放不下他的天朝意像，如果天朝意像崩潰了，他本身的自我意像也將崩潰，這就是道光皇帝的「憂憤苦衷」。

乍浦、吳淞、上海、寶山相繼失守後，道光皇帝仍然採取這種兩面政策，在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三，接到耆英奏稱英帥同文謂「不能戢兵，仍與相戰」，這又刺傷了道光皇帝的天朝意像，於是一反兩面政策，負氣的擺出強硬態度，下諭旨道：「覽奏可惡之至！該逆既不肯戢兵，若再事羈縻，不特於事無益，且恐有傷國體。著與牛鑑、程喬采專意勸辦，無稍游移。」（註五一）但過了六天，得耆英奏，內稱：「該夷前有侵犯天津之謠，茲偽示內又有直抵京師之語。」（註五二）直抵京師！這太嚴重了，道光皇帝不能再冒險賭注了。他對中國的武備已完全失去信心，假如英國軍隊真的直抵京師，則天朝的顏面真不知要擺到何處，兩害相權取其輕，道光皇帝讓步了，雖然有百般的不願意和憤恨，還是讓步了。但，縱使做了最大的讓步，他仍然是天朝的天子，他仍擁有完整的天朝意像，他只是吃了「犬羊醜類」之虧，要羈縻，也要像個天朝的天子。做爲一個天朝的天子，除天威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聖德，既然無法顯示天威，唯一能做的只是聖德的表現。英國人雖然大大的冒犯天威，但道光皇帝認爲犬羊之性，惟利是圖（註五三），而且「苗蠻逆命，何損堯舜之朝」，具有聖德的天朝天子，是不值與之計較的，且施恩於外夷，亦能表示天子聖德之廣大。這雖然是天朝意像受損後，合理化的解釋，但，就天朝意像的另一面，是解釋得通的，縱便是合理化的解釋。而更重要的，做爲一個天子的責任是保全子民的生命，這才是真正的聖德。因此，道光皇帝雖然忿恨之至，但，「朕因億萬生靈所繫，實關天下大局，故雖憤悶莫釋，不得不勉允所請，藉作一勞永逸之計，非僅爲保全江浙兩省而然也。」（註五四）就道光皇帝來說，南京和議，他仍然是按照天朝天子所應有或被期望的舉動來做，雖然感到遺憾甚至憤恨，但是他仍然保全他的天朝意像，而且緊緊守著這天朝意像。道光皇帝的決策與行爲，亦完全按照此意像所衍生的行爲模式去處理，其目的只是企求意像與事實間的一致。

五、浩浩天恩：伊里布、琦善、耆英的天朝意像

鴉片戰爭期間，主撫派的主要人物，無疑的是伊里布、琦善與耆英三人。他們脫不了當時的歷史界限，與一般知識份子相同，具有天朝意像，而且在與英國人接觸之前，他們都是主張以天威壓服外夷的主戰者，及至實際與英國軍隊接觸，認識到英國的船堅砲利，才轉而主撫。例如伊里布曾把此意告訴劉韻珂，自謂在定海失守之初，專意勸辦，且曾經專摺密奏，有「必須使該逆創鉅痛深，方可冀其懾服」之語，等去浙江，實際體察敵我的實力，「始知前言不能自踐。」（註五五）耆英在戰後亦曾現身說法，謂：「自英夷犯順以來，言事者紛如聚訟，主戰者無不以撫爲非，主撫者無不以戰爲難。即臣前在盛京將軍任內，體察該處情形，實有天險可恃，戰雖不足，守則有餘，亦主戰而後撫，以示恩威。迨抵江寧省城，目擊兇餓鴟張，竟有戰守兩不足恃之勢，不得不暫事羈縻，以免斯民之鋒鏑。」（註五六）至於琦善，至始至終深深相信，中國的軍隊武器絕不是英軍的對手，尤其是到廣州之後，這個信念更加堅定，由此一意主撫到底。

伊里布、琦善與耆英的主撫，一方面固然是迫於情勢，想威也威不起來，另一方面也因他們雖亦具有天朝意像，但他們是滿州貴族，而滿人與漢人所背負的歷史傳統不同，就漢人來說，天朝意像可直追溯到堯舜以來的文化傳統，因此對外的態度與行爲，文化意識是天朝意像的核心。對中國人來說，文化意識是最堅固的堡壘，再加天朝意像，使漢人在文化上、情緒上都不願給西洋人以平等的地位。但滿州人就不同，如果追溯滿州人的歷史傳統，則他們本來亦是漢人所謂的夷人，在這一點上，他們與西洋人是站在平等的地位，而且從這一點再想到目前滿人的天朝地位，滿州人更能體認到所謂天朝的非永恆性。因此，除了做爲天朝中心的道光皇帝之外的滿州人，除非已經完全漢化，否則與漢人比較起來，滿人更能擺脫天朝意像的情緒性反應，在與外人交涉時，更能表現出平等與寬和的精神。他們可以打破傳統禮教嚴謹的夷夏之防，如意的與英國人打交道，亦不因此而覺得違背了禮教，成爲禮教罪人。故他們並不堅持天朝威的一面，而走向消極的恩的一面來羈縻外夷。兩江總督牛鑑上奏乞求恩准和議的一段話，就是他們天朝意像的立足點，也是他們主和的理論基礎，牛鑑說：「臣竊思，苗民逆命，大禹班師，欲取

始與，老氏之術。又高宗純皇帝時，征緬不克，降詔罷兵，後復允其朝貢……仰見聖德同天，於撻伐誅殛之中，恢包涵徧覆之量，事有相類，擬非不倫。如果該夷祇爲籲乞通商，並不敢妄蒙他念，中外同係赤子，休兵並免夷傷，合無仰求皇上網開一面。……然後明宣恩旨，用示懷柔，謂吾民橫遭毒饑之張，而朝廷何愛一廛之與。彼雖畜類，亦具人形，譬如桀犬狂吠，本不足以論是非，及投以肉食，未嘗不搖尾而帖伏。從古制夷之道，不外羈縻，是則仁聖與民休息，耀德而不觀兵，並無傷於國體。」（註五七）即是，天朝要表示天朝大量能容的風度，外夷的滋擾，只如桀犬狂吠，不足與論是非，且彼既爲利而來，則天朝何愛一廛之與，以利啖之，則搖尾而帖伏，如此更能顯示天朝「耀德而不觀兵」的聖德與廣披的天恩。不管他們是否真的如此相信，抑或只是合理化的藉口，都表示了他們的天朝意像，而且只有在這天朝意像才能找到他們行動的根據，不管是理性的或情緒性的，抑或只是合理化的自我安慰。

除了這恩撫的共同立足點之外，伊里布、琦善與耆英的撫夷亦有他們各自不同的出發點。琦善主要是個現實主義者，他所估計的是現實的情勢，既然體認到威不足以制英人，則只有用恩撫一途。耆英則是個權宜主義者，他雖然認爲撫夷應該以誠破詐，但他所考慮的是利害關係，南京談判時，耆英的原則是「但計事之利害，不復顧理之是非」（註五八），因爲已到兵臨城下的地步，無法再硬撐天朝的威嚴，只能從利害上去計較。如關於過去天朝所一直堅持不讓的平行禮問題，耆英認爲：「平行雖屬末節，於天朝體制亦大有所損。惟既經羈縻，亦復無暇顧及。」（註五九）至於伊里布，因爲是進士出身，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較深，比較傾向儒家的德化主義。他認爲：「撫馭外夷之道，總在示之以誠，儻能先服其心，自可漸就吾範。」（註六〇）伊里布的原則是，開誠布公，以恩德感服外夷。而且伊里布有一個更基本的看法，以爲「兩國交兵，殺人費餉，連年不已，祇爲通商一事，甚屢無謂。」（註六一）就伊里布的態度說，通商本來就是天朝德化外夷的事，如果爲通商而連年交兵，實在是無謂之事，亦失天朝懷柔外夷的本意，天朝只有用更大的恩德，使外夷心悅誠服。至若伊里布與英人交涉的寬和融洽態度，雖然極爲英人讚賞，但並不表示伊里布已放棄天朝意像，相反的，這正是伊里布以誠服其心和以德感之的天朝意像的表現。

六、天朝意像的情緒反應：一般知識份子的對外態度

在鴉片戰爭期間，其他不主持交涉事務的一般知識份子，對「英夷犯順」所表現出來的，是直接的情緒性的強硬態度。本來兩國交兵，這種態度是自然的，但一般知識份子的天朝意像却使這種態度更加強烈而持久，這就是一般知識份子主戰的基本動因，也是他們主戰的最大理由和目標。如黃爵滋的教陳六事疏；萬啓心、石景芬、唐鑑、高人鑑、蔡家珩、朱成烈等人的奏摺；宋其沅、王得祿致書伊里布請專議剿，就是這種情緒與態度的典型表現，可爲一般知識份子的縮影與代表。「嘆咭喇說」的作者就充分道出了他們共有的感覺與情緒：「今乃據地以要，殺人以逞，脅我以兵，而指款以索。夫義律者，啖夷一市儈之首耳，一戰再戰，猶之盜坐堂上，鞭撻而索賫財，不許則更撻，服掌宰相，奴隸大臣，忽殺忽傷，忽奪忽棄。以天下之大，被弄於群夷，中國之尊，受弄於一儈，古今之恥，孰甚於此。」（註六二）爲了挽回天朝的國威，以滿足天朝這個意像所附帶的情緒或感情，只有對挑戰者還以顏色，始能維持本身應有的尊嚴。這種天朝意像的情緒面，在裕謙與廣東士紳的身上，表現得最清楚甚或極端，茲就裕謙與廣東士紳的天朝意像的情緒面稍加探討。

裕謙雖是蒙古旗人，但却是進士出身，他深深接受儒家的思想與禮教，擁有最堅決的天朝意像。裕謙始終堅信：「僻處海陬」的英國，竟敢與天朝「視同敵體，實屬夜郎自大」。（註六三）而且認爲英國人「性等犬羊，勝之不武」，在意識裏甚至不把英國人當人看。故他的對策是絕對的威制主義，因爲「此等犬羊之輩，使之知畏易，使之知感難，且非使之知畏，更難使之知感。」（註六四）裕謙的天朝意像，使他在意識裏情緒上，根本就否定了英國人存在的價值，至少與天朝一比，是微不足道的卑下種族。當裕謙知道琦善議和的消息，馬上參奏琦善，憤然的說：「中國威者皆忠義之臣，而不顧國體者，皆奸佞之輩。」（註六五）字裏行間我們都可感覺到裕謙那高昂的情緒。當他憤恨的情緒達最高點時，爲了使英國人的語言變成事實，裕謙真的把兩名被俘的英軍剝皮抽筋，把人筋拿來當馬韁，於此可見裕謙情緒反應的激烈。就是這激烈的情緒，使裕謙在鎮海戰敗之後，身殉天朝。我們或許可說，裕謙的身殉，是他不願或羞憤承受戰敗以後殘破的天朝意像。

中英在廣東的軍事衝突，中國連連戰敗，加以英軍的紀律不好，淫掠百姓，激起廣東士民的義憤，更加强士民原有的天朝意象，而有三元里事件的發生。三元里事件是廣東士民一直引以自傲的「勝利」，添補了中國因戰敗而受損的天朝意象，亦使排外的情緒更加高漲。因此把前往三元里勸導罷戰的廣州知府余保純冠以漢奸之名（註六六），於鄉試的時候，因為余保純到場，結果「文章譁然，皆云：我輩讀聖賢書，皆知節義廉恥，不考余漢奸試。」（註六七）且以瓦塊擊破余保純的轎子。可知，凡是不符合天朝對外夷應有的行為模式，當時的人皆以漢奸目之，雖然這多少帶點情緒性。而廣東士民把天朝意象的情緒性表現得更徹底的，是三元里事件後的「廣東義民斥告漢夷說帖」（註六八）。此說帖緊守著天朝意象，極力陳說天朝的恩德與仁義，並且痛罵英國人爲犬羊、猪狗、鬼子與「不過能言之禽獸而已」；謂英國爲畜邦、狗邦；認爲英國的告示是「一派混賬」。而中國的戰敗，並非無能，而是天朝仁慈，特別可憐英人「身同畜類，性本無知，豈有人與畜鬥之理」。這完全是極度情緒性的反應，這反應亦由天朝意象而來。因爲意象上中國與英國本來就在不平等的層面，中國當然很難在事實上以平等的地位來對待英國。當英國以實力或事實，打破天朝意象威的一面，中國的天朝意象已經殘破了一半，此時，最自然的是情緒的反應，我們說這是合理化的補償作用，亦未嘗不可。然而，天朝意象的恩的一面，可以使合理化顯得更「合理」，而在心理上圓滿解決天朝在威的一面所受的挫折。如此，天朝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天朝，並不因戰敗而有所不同。

江寧議和之後，一般關心國事的士紳，尙能理智而踏實的檢討這有清以來前所未有的變局，而謀補救預防之道。如黃恩彤的撫夷論；方東樹的病榻罪言；吳敏樹的禦夷私議；而最有名，影響最深遠的，當推魏源的籌海篇。他們雖然盡量避免表現過度情緒性的反應，但他們的目的仍然是爲恢復維持天朝意象與事實的一致。例如魏源在戰後馬上以景仰懷念的心情，回顧清朝爲天朝的黃金時代的輝煌歷史，寫下了聖武記。希望天朝的「聖武」能够繼續維持下去。魏源主張以夷制夷、師夷長技以制夷，並不表示他已擺脫天朝意象，他仍然植根於天朝的傳統裏，因爲以夷制夷，師夷長技以制夷，都可以在中國的傳統裏找到事例，魏源亦在這些事例裏找尋他的理論根據。魏源是理性的去維護天朝意象，希望這意象在事實層面上實現，而不像一般的知識份子情緒性的以爲款夷與師夷就是天朝示弱的表現。同樣一個天朝意象，可以有理性與情緒性的不同反應，而情緒性的反應是

最普遍的，只看理性能否作適當的控制。

七、結 論

鴉片戰爭雖然是因禁烟而起，但我們可說鴉片戰爭是在英國的求變與中國企求維持傳統的天朝體制的意願之間而展開。中國應付這場決定性戰爭的對策，完全是天朝傳統的馭夷技巧。中國方面的決策與行動，一直受到天朝意像的支配，而天朝意像本來就同時具有威與德（恩）的兩面內涵，更容易引起情緒性的反應。採取強硬態度的主戰者，是想維持天朝在實際威勢上的優勢，企圖在事實層面實現天朝意像。採取羈縻政策的主撫者，實際上是從天朝意像威的一面敗退下來，但是，却很巧妙的在德恩的一面找到天朝意像的第二道防線與立足點，維持天朝意像於不墜。

鴉片戰爭，就其歷史意義言，誠然是中國史上千古的一大變局。但是中國本身對這變局意義的認識，並不在戰後的道光朝，而是在英法聯軍之後的所謂洋務運動或同治中興。因為天朝意像不管在戰前或戰後，一直支配著中國朝野上下的對外態度與行動。戰後，由於中國方面的自我防衛與情緒性的憤恨報復心理，使天朝意像更加的高漲而鮮明。不管在鴉片戰爭期間，中國的天朝意像是否受到損傷，或遭事實的否定，中國方面在意識上絕不承認這是事實，因為天朝意像的核心是文化意識與道德規範，這並不是一次沿海的戰爭所能否定的，更何況中國方面認為鴉片戰爭是英國人的不仁不義，被不仁不義的「蠻夷」所欺侮，中國上下只感到憤恨與屈辱。在這憤恨與屈辱中，中國更需要發揮天朝意像，以彌縫在戰爭期間受損的傷口。於是有戰後的廣東進城問題，與咸豐朝的極端保守傾向，這種受挫後極端的天朝意像的自我防衛，間接直接的又引起另一場中外戰爭——英法聯軍之役。

中國這種天朝意像，與由此意像所衍生的對外關係，是傳統中國政治社會結構的擴大與引伸，亦是中國人深深植根於此結構的行為模式。按照儒家的理論，天子在中國宗法父權社會裏所扮演的，是擴大了的父親角色。天朝與四夷的關係，就是這種內在結構的往外延伸，而扮演著類似父親的角色——雖然隱藏著自衛的目的。所謂威與德，本來就是中國文化對天子與父親這

個角色的要求與期望，亦是天子或父親在理論上所賴以統馭天下或家族的技巧。而強調德化主義的儒家思想是中國人——尤其是天子與父親——行爲的核心，亦是中國人理想的行爲模式。所謂王道或「耀德而不觀兵」，正是這種行爲模式的表現。這種以德報怨的聖德意像，是中國文化的自我期望與理想，由此對中國人的行爲產生規範的作用與行爲的根據。中國這種爲維持內在秩序而發展的行爲模式，由天朝意像而擴大引伸爲維持外在秩序的行爲模式。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這種行爲模式——至少對外的方面——面臨最大的挑戰與考驗。

從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史，可說是天朝體系被迫結束的歷史。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的天朝意像一再的受到挑戰與破壞，鴉片戰爭之後，還有恩德的第二道防線與立足點，等到英法聯軍兵臨都城北京，第二道防線亦不足成事，中國人才驀然驚醒，開始發展洋務運動。此後的中國對西洋人，再也無法堅持所謂天朝體制，甚至被迫漸漸的接受西洋近代的外交體制。中國的天朝意像漸漸的在衰退之中，及至清朝的藩屬被列強掠奪殆盡，所謂天朝已到名存實亡的地步，中國人不得不面對承認天朝結束的事實，隨著滿清退位，中國史上最後一個天朝亦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之中。

天朝不存在了，中國人的天朝意像自然沒有著落之處，但是這個意像與其衍生的行爲模式，主要是依賴夷夏之防的文化意識與道德觀念，這是深深的植基於中國的文化體系之內。天朝雖然不存在了，但中國文化依然存在，中國兩千多年來所擁有的文化優越性，並不容易在意像上消退，於是天朝意像很自然的轉變成「文化大國」的意像。這在實質上仍無多大的不同，中國人仍然堅持植根於自己的文化裏的行爲模式。這可以解釋清末以來，中國對西方反應的遲緩，是天朝或文化大國的意像在中國產生一種內在的抗力，這亦可說明全盤西化論在中國的失敗。這，在現代來說，是中國文化的弱點，也是中國文化的優點。

附 註

註一：蔣廷黻：「琦善與鴉片戰爭」。段宏俊編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論集」，頁五五。

註二：姚廷芳：「鴉片戰爭與道光皇帝、林則徐、琦善、耆英」，自序，頁一。

註三：See George A. Theodorson and Achilles G. Theodorson ed.: *Modern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1969.

鴉片戰爭期間中國朝野的天朝意像及其衍生的觀念、態度與行動 (1839—1842)

- 註四：See C.E. Izard and S.S. Tomkins: *Anxiety as a negative affect*, in C.D. Spielberger ed.: *Anxiety and Behavior*, 1966, P.105.
- 註五：有關中國天朝觀念的形成與因此而建立的朝貢體系，可參看 J.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一書，尤其是其中 J. K. Fairbank、楊聯陞 (Lien-sheng Yang)、王庚武 (Wang Gungwu) 與 Mark Mancall 的文章。
- 註六：關於天朝的無所不包性，可參看王庚武著 "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background essay" 一文。The idea of inclusiveness" 一節，前書，頁五四至六〇。
- 註七：關於天朝一視同仁的觀念可參看前文 "The idea of impartiality" 一節，前書，頁五〇至五四。
- 註八：有關羈縻，可參看楊聯陞著 "Historical notes o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一文中 "The Chi-mi or 'Loose Rein' Policy: A historical survey" 一節，前書，頁三二一至三三三。
- 註九：王宮保得祿致伊節相里布書，入寇志所收，鴉片戰爭文獻彙編(三)頁二九九。
- 註一〇：康熙在晚諭裏的用字如：「歸順」、「勦撲」、「殄滅爾噍類」等都是天朝意像的表現。見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第一冊。頁二四所引康熙御制史。
- 註一一：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四冊，頁四三下。
- 註一二：宣宗語，見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三冊，頁五一上。
- 註一三：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頁二八下。
- 註一四：如道光元年，兩廣總督阮元，照例用封餉的辦法，逼美國船交出傷斃民婦的水手，「照例絞決，以彰國憲。」(參看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一冊，頁七下—九下)。又道光九年，兩廣總督李鴻賓，亦以封餉抵制英船以追還商欠和減少規銀爲要挾而拒不進口的行動。(前書，第三冊，頁十五下)。又道光十年，廣州將軍慶保，亦以強硬措施對付帶番婦坐轎進省居住並將船內槍砲偷運夷館的英國大班。(前書，第三冊，頁五十一上)。
- 註一五：林則徐給英國的照會，收在梁廷枏的夷氛聞記，錄自鴉片戰爭文獻彙編(六)頁十四。
- 註一六：同前註。
- 註一七：鴉片戰爭文獻彙編(二)，頁一四五。
- 註一八：葛士濬輯，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七十七，頁七上。

註一九：林則徐：信及錄，頁一二，轉引自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第二冊頁一七七。

註二〇：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十六，頁十八下。

註二一：這就是林則徐在定海失守以前，聽說英船北駛時上奏的看法，以爲若英船北駛天津求通貿易——不是開戰尋釁——而且恭順的話，則可仰懇天恩，優以懷柔之禮，使其就我範圍，而且「倘所遞之詞，有涉臣等之處，惟求欽派大臣來粵查辦，俾知天朝法度，一秉大公，益生其敬畏之誠，不敢再有藉口。」（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十一頁二五上）這並不如郭廷以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一書裏所說的表示林則徐亦主張懷柔安撫了事，這事我們必須從清朝的行政體系去了解。清廷的定制，與外夷交涉是地方政府的事，如果地方政府無法解決，而使夷人欲直達京師交涉，則皇帝只有略示懷柔，或撤換地方首長，夷人仍同原地交涉。林則徐在奏摺內亦提到嘉慶二十一年，英使阿美士德曾北由內河護送至粵的成例，希望按例辦理。皇帝本人是不值與夷人直接交涉的，林則徐無法在廣東解決交涉事宜，而驚動京師，亦只有按例自請查辦，這並不表示他已經軟化，只是限於清朝的行政體系罷了。由定海失守後，林則徐態度的強硬與主戰的堅決，我們即可明白此中的曲折原委。

註二二：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十六，頁二十下——二十一上。

註二三：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第二冊，頁四一九。

註二四：大清十朝聖訓，宣宗成皇帝，卷六，頁一上。

註二五：前書，卷六，頁二下。

註二六：同前註。

註二七：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頁二八下——二九上。

註二八：前書，卷八，頁三六上——三七上。

註二九：道光皇帝給林則徐的奏摺的硃批是：「外而斷絕通商，並未斷絕，內而查拏犯法，亦不能淨，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以何詞對朕也。」前書，卷十三，頁四下。

註三〇：前書，卷十三，頁三下。

註三一：道光皇帝在此年十二月補充解釋此時的決策謂：「該夷因斷絕貿易，貪利無厭，其始乞恩查辦，朕因該夷惟利是視，不值竭中國財力與之計較，敕示羈縻，原冀平其驕悍之氣，便可戢兵。」（前書，卷十八，頁六上。）

註三二：前書，卷十八，頁五下。

註三三：前書，卷十八，頁十六上。

註三四：前書，卷十八，頁十七下。

註三五：前書，卷二十，頁九下。

註三六：前書，卷二十二，頁十七上。

註三七：道光廿一年二月初六，道光皇帝得知割讓香港，於是下了一道「琦善擅割香港著即革職鎖拿來京諭」：「朕君臨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琦善擅與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是直代逆乞恩，且伊被人恐嚇，奏報粵省情形，妄稱地利無要可扼，軍械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摘舉數端，危言要挾，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誤國，實屬喪盡天良。」（前書，卷二三，頁五上—五下。）凡此皆可見道光皇帝天朝意像或自我意像受傷後的情緒性反應。

註三八：前書，卷二三，頁三十上。

註三九：同前註。

註四〇：前書，卷二六，頁三八上。

註四一：前書，卷二六，頁三九上。

註四二：奕山的奏摺見前書，卷二九，頁九上—十三上。

註四三：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第二冊，頁三六二。

註四四：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九，頁十三上。

註四五：此處的所謂兩次擊退英軍，是指廣州之戰中，奕山虛報的火船夜襲與泥城砲台之戰，見前書，卷二八，頁三二上—三四下。

註四六：前書，卷二九，頁十三下。

註四七：前書，卷三十，頁十五上—十九下。

註四八：前書，卷三二，頁三五下。

註四九：前書，卷三五，頁十四下。

註五〇：前書，卷四七，頁四十下。

註五一：前書，卷五三，頁十三下。

註五二：前書，卷五三，頁三五上。

註五三：按照軟塵私議的記載，道光皇帝在南京條約簽訂之後，接獲怡良奏稱英夷索還台灣已殺之俘之後，說：「這個東西，不過又要我找些銀子罷了。」（鴉片戰爭文獻彙編四，頁五二九。）

註五四：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九，頁三下。

註五五：此事見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劉韻珂的奏摺內，前書，卷三五，頁六上—六下。

註五六：鴉片戰爭文獻彙編，頁四六五。

註五七：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三，頁二六下—二七下。

註五八：前書，卷五九，頁三二上。

註五九：前書，卷五九，頁三三上—三三下。

註六〇：前書，卷十五，頁三四上。

註六一：伊里布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一日致英陸路元帥照會內的話，見前書，卷四九，頁二七下。

註六二：鴉片戰爭の研究、資料篇，頁二六八。

註六三：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十五，頁三下。

註六四：前書，卷十九，頁三八下。

註六五：鴉片戰爭文獻彙編，頁五一六。

註六六：前此，余保純曾代表琦善堅城求和，已被視為漢奸。且余保純曾在廣州城外遇到熟識的英國人，而互相揭帽為禮，一時輿論譁然，道路以目，以為余保純羞辱朝廷，不知廉恥。（鴉片戰爭文獻彙編，頁十五）。

註六七：前書，頁十五—十六。

註六八：見史料旬刊第三十八期頁四〇—四一四，轉引自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第一輯頁二一四〇—二一四二。